

墓志官职名索引》(主持人平田茂树,《平成一七——二一年度文科省特定领域研究成果报告书》)是利用价值很高的索引。

以上对2009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分领域进行了回顾,和历年相比未看出有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问题意识的提高,研究课题不再受到限制,去年很多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进展。问题的多样化,在此基础上具体研究的积累,是对历史时代进行细致分析不可欠缺的工作。而且,对多样化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的课题为什么会在今天提出的思考,与历史学本身的丰富紧密相连。一方面,研究者有必要一边思考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所研究的时代和领域中占有怎样的位置,一边展开自己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在2009年的成果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论文欠缺这样的意识,未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具体的研究动态之中。最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他人研究成果的不关心。在问题意识的基础上,研究者通过和他人进行对话,不仅仅停留于个别研究,而是将其放在贯通的历史叙述中,定位各自的研究成果,向世界传递信息,这一做法很重要。另一方面,2009年仍可以看到一些论著对以往未深入讨论的概念进行再探讨。对迄今为止被认为不言自明的概念提出疑问,是创造新体系的第一步。以这样修正了的概念为基础,到底能够构建怎样的历史面貌和历史理论?这应当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历史专业研究者的课题。

在本文结束时,附记2009年出版的专著:丸山雍成《邪马台国 魏使步行之路》(吉田弘文馆)、菊地章太《神呪经研究》(研文出版)、渡边义浩《后汉“儒教国家”的形成》(汲古书院)、满田刚《三国志 赤壁传说》(白帝社)。

## 围绕《大唐元陵仪注》的诸多问题

金子修一(日本学习院大学 日本) 撰

博明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译

—

成书于德宗朝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的杜佑《通典》的“凶礼”卷中收录了一系列以《大唐元陵仪注》等为题的逸文。元陵为唐朝的代宗陵,因此《大唐元陵仪注》便成了详细记载代宗丧葬仪礼程序的史料。

在中国,同一朝代的先帝驾崩后要由下一位皇帝即位,因此,皇帝的葬礼程序成为一种与新皇帝即位相关的重要仪礼。但是,在古代中国,记载皇帝丧葬仪礼的史料并不多,即便在《大唐开元礼》当中也完全没有皇帝葬礼或是与即位相关的条目记载。大津透先生曾列举出《新唐书》卷二〇《礼乐志》一〇的开头部分:

五曰凶礼,周礼五礼,二曰凶礼,唐初从其次第五。而李义府、许敬宗以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国卹一篇。由是天子凶礼阙焉。至国有大故,则皆临时采掇附比,以从事。事已则讳而不传,故后世无考焉。

大津透指出,正如高宗朝的显庆礼编纂的,因为凶事不应该是臣子的提言,把贞观礼中的国卹(恤)篇即天子凶礼的部分删除,每位皇帝驾崩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仪注,皇帝的丧葬结束时忌讳言传,所以使得皇帝的凶礼也不留传给后世<sup>①</sup>。根据以上观点,《通典》所引的《大唐元陵仪注》(以下简称《元陵仪注》)是详细记载唐代皇帝大丧全貌的珍贵史料。我从十几年前就开始释读《元陵仪注》,在此次来中国前恰好完成了释读工作,故在此将其概要作如下阐述。

## 二

对于“皇帝制度”<sup>②</sup>,我已从《通典》中确认了有如下《大唐元陵仪注》等逸文的存在。

- (1) 卷五二 礼一二·吉礼一一 丧废祭议——《大唐元陵之制》
- (2) 卷八〇 礼四〇·凶礼二 总论丧期——《大唐元陵遗制》
- (3) 同卷 奔大丧奔山陵附——《大唐元陵仪注》
- (4) 卷八一 礼四一·凶礼三 诸侯及公卿大夫为天子服议——《大唐元陵遗诏》
- (5) 同卷 宗室童子为天子服制议——《大唐元陵之制》
- (6) 卷八三 礼四三·凶礼五·丧制之一 复——《大唐元陵仪注》
- (7) 卷八四 礼四四·凶礼六·丧制之二 沐浴——《大唐元陵仪注》
- (8) 同卷 同上 含——《大唐元陵仪注》
- (9) 同卷 同上 设铭——《大唐元陵仪注》
- (10) 同卷 同上 悬重——《大唐元陵仪注》
- (11) 同卷 同上 小敛——《大唐元陵仪注》
- (12) 卷八五 礼四五·凶礼·七丧制之三 小敛奠代哭附——《大唐元陵仪注》
- (13) 同卷 同上 大敛——《大唐元陵仪注》
- (14) 同卷 同上 大敛奠——《大唐元陵仪注》
- (15) 同卷 同上 殓——《大唐元陵仪注》
- (16) 同卷 同上 将葬筮宅——《大唐元陵仪注》
- (17) 同卷 同上 启殡朝庙——《大唐元陵仪注》
- (18) 卷八六 礼四六·凶礼八·丧制之四 荐车马明器及饰棺——《大唐元陵仪注》
- (19) 同卷 同上 祖奠——《大唐元陵仪注》
- (20) 同卷 同上 遣奠——《大唐元陵仪注》
- (21) 同卷 同上 挽歌——《大唐元陵之制》
- (22) 同卷 同上 葬仪含葬附——《大唐元陵仪注》
- (23) 卷八七 礼四七·凶礼九·丧制之五 虞祭——《大唐元陵仪注》
- (24) 同卷 同上 祔祭——《大唐元陵仪注》
- (25) 同卷 同上 小祥变——《大唐元陵仪注》

(26) 同卷 同上 大祥变——《大唐元陵仪注》

(27) 同卷 同上 禫变——《大唐元陵仪注》

(28) 卷一〇四 礼六四·凶礼二六 帝王谥号议——《大唐元陵谥册文》

以上的前后顺序与实际丧葬仪礼的顺序几乎重合。但是,(9) 设铭以及(10) 悬重作为正确的仪礼顺序应排在(14) 大敛奠之后。此外,这一大敛奠的开头文是“皇帝至位哭,内外皆就位哭”,而(15) 殓的末尾文是“礼仪使就位,奉引皇帝至位哭,内外皆就位哭”,这又与大敛奠的开头文完全重合。实际上,作为仪礼的顺序也应该是按大敛—殓—大敛奠排序。照此顺序考虑的话,可以判断其前后几个条目的顺序应该是按照小敛—小敛奠—大敛—殓—大敛奠—设铭—悬重的顺序排列。还有,关于(16) 将葬筮宅是什么时候举行的这一问题,还没有考察的线索。看《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条的原注的话,在太宗的昭陵中,玄宫是在太宗驾崩后开始修建的,因此,我认为把“将葬筮宅”置于“殓”后是没问题的。但是,(25) 小祥变、(26) 大祥变、(27) 禫变,在代宗驾崩时则是“以日易月”,即在驾崩一个月以内举行。代宗的驾崩是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二十一日,小祥“变”为丧服变除之意,丧葬仪礼之语为小祥。以下“变”字皆省略)是闰五月四日,大祥是闰五月十六日,禫则推定为次日的十七日或之后的十八日。这一日程比(17) 启殓朝庙以下的一系列仪礼要早进行,而启殓朝庙是从同年十月四日的(22) 葬仪的前十天开始举行。实际上,在禫与启殓之间有四个多月的间隔时间,因此我在“《大唐元陵仪注》概说”<sup>③</sup>一文中把“将葬筮宅”置于“禫变”之后,不过,也可以将其置于“小祥变”之前。

另外,(20) 遣奠中有阅读哀册文的礼仪,这篇代宗的哀册文是在《文苑英华》卷八三六哀册文之下作为《代宗睿文皇帝哀册文》(崔祐甫)收录的。在唐代,除代宗以外,完整地具备哀册文和谥册文的皇帝只有中宗。如果与(28)《大唐元陵谥册文》加在一起,代宗的哀册文是唐皇帝的丧葬仪礼中一套极为珍贵的哀册文与谥册文<sup>④</sup>。在这里,将《代宗睿文皇帝哀册文》置于“遣奠”之后,经过这样的修正后将变为以下的排序。虽然其中多少会含一些推测的成分,但我认为代宗的丧葬仪礼在时间上大致可以按如下顺序排列。

(1) 卷五二 礼一二·吉礼一一 丧废祭议——《大唐元陵之制》

(2) 卷八〇 礼四〇·凶礼二 总论丧期——《大唐元陵遗制》

(3) 同卷 奔大丧奔山陵附——《大唐元陵仪注》

(4) 卷八一 礼四一·凶礼三 诸侯及公卿大夫为天子服议——《大唐元陵遗诏》

(5) 同卷 宗室童子为天子服制议——《大唐元陵之制》

(6) 卷八三 礼四三·凶礼五·丧制之一 复——《大唐元陵仪注》

(7) 卷八四 礼四四·凶礼六·丧制之二 沐浴——《大唐元陵仪注》

(8) 同卷 同上 含——《大唐元陵仪注》

(9) 同卷 同上 小敛——《大唐元陵仪注》

(10) 卷八五 礼四五·凶礼七·丧制之三 小敛奠代哭附——《大唐元陵仪注》

(11) 同卷 同上 大敛——《大唐元陵仪注》

(12) 同卷 同上 殓——《大唐元陵仪注》

(13) 同卷 同上 大敛奠——《大唐元陵仪注》

(14) 卷八四 礼四四·凶礼六·丧制之二 设铭——《大唐元陵仪注》

- (15) 同卷 同上 悬重——《大唐元陵仪注》
- (16) 卷八七 礼四七·凶礼九·丧制之五 小祥变——《大唐元陵仪注》
- (17) 同卷 同上 大祥变——《大唐元陵仪注》
- (18) 同卷 同上 禫变——《大唐元陵仪注》
- (19) 卷八五 礼四五·凶礼七·丧制之三 将葬筮宅——《大唐元陵仪注》
- (20) 同卷 同上 启殡朝庙——《大唐元陵仪注》
- (21) 卷八六 礼四六·凶礼八·丧制之四 荐车马明器及饰棺——《大唐元陵仪注》
- (22) 同卷 同上 祖奠——《大唐元陵仪注》
- (23) 同卷 同上 遣奠——《大唐元陵仪注》
- (24) 《文苑英华》卷八三六 《代宗睿文皇帝哀册文》
- (25) 卷八六·礼四六·凶礼八·丧制之四 挽歌——《大唐元陵之制》
- (26) 同卷 同上 葬仪合葬附——《大唐元陵仪注》
- (27) 卷八七 礼四七·凶礼九·丧制之五 虞祭——《大唐元陵仪注》
- (28) 同卷 同上 祔祭——《大唐元陵仪注》
- (29) 卷一〇四 礼六四·凶礼二六 帝王谥号议——《大唐元陵谥册文》

### 三

下面需要思考的是,从以上条目所看到的《大唐元陵之制》、《大唐元陵遗制》、《大唐元陵遗诏》、《大唐元陵仪注》之间的区别,具有怎样的意义?其中关于《大唐元陵遗制》和《大唐元陵遗诏》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2)总论丧期的《大唐元陵遗制》是部分地引用了《代宗遗诏》(收于《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众所周知,则天武后是为了避讳与自己的“𪚩”同音的“诏”而用“制”,武后退位后又开始重新启用“诏”,因此,唐末期随处可见“诏”与“制”并用的现象。在(4)诸侯及公卿大夫为天子服议的《大唐元陵遗诏》中,开头部分的“天下人吏,敕到后,三日释服”是代宗的遗诏,此文在(2)当中也有。在(4)的文中是对其下文的“公卿百寮,不同人吏”的议论,针对前引的代宗遗诏,作为臣下(大概是以礼仪使颜真卿为中心)的意见(议)是很重要的。在“大唐元陵之制”的(1)丧废祭议当中,引发了遇到殡葬仪式之前夏至来临的话,夏至是否还必须祭祀皇地祇的讨论。监察御使张朔认为应该祭祀,而与其意见相反,礼仪使颜真卿则认为鉴于各种情况,在夏至时祭祀皇地祇比较困难。也就是说,在这里臣下们的议论成了这一条目的中心内容。还有,在(5)宗室童子为天子服制议当中,有一句“今以准遗诏”,虽然不能说皇帝在自己的诏敕中如此表达是绝无仅有的,但从其文意中可以看出,这恐怕是礼仪使颜真卿把百官的议论汇集起来后上奏给皇帝的。

“丧废祭议”与“宗室童子为天子服制议”是杜佑编撰的条目名称,除了(1)和(5)以外,还收集了下臣的上奏或上议等。(5)是继承了“魏晋故事曰……”以及“应琳议……”等短文后编制的,作为相当于应琳等人的议论,杜佑把颜真卿上言的一部分收录在《大唐元陵之制》当中。还有(4)诸侯及公卿大夫为天子服议,与其相关的文章在代宗遗诏中也有,因此可以说杜佑照其原意把(4)的标题表述为《大唐元陵遗诏》,不过,其中的条目内容从整体上看与(1)和

(5) 的《大唐元陵之制》是近似的。另外,(3) 奔大丧的《大唐元陵仪注》中“诏问……所司奏曰……又曰……”的记载,明显是下臣对皇帝的咨询而呈的上奏。它与(6) 以下的仪注形式不同,(3) 中《大唐元陵仪注》与(1) 或(5) 以及(4) 相同,我认为还是把它们看做是《大唐元陵之制》的误记为好<sup>⑤</sup>。

相对以上内容,(6) 以下基本上是《大唐元陵仪注》,其内容也与其称谓“仪注”相符。其中只有一处略有不同,那就是(25) 挽歌中的《大唐元陵之制》。本来,“挽歌”是把灵柩运至陵墓这一段所唱的劳歌,但(25) 所描述的是向皇帝的山陵移动的葬列的构成,并没有表述葬列向山陵移动的仪礼。文末的“其百官制,鸿胪寺司仪署令掌挽歌,三品以上六行三十人(下略)”中的关于百官的挽歌(葬列),由鸿胪寺的司仪署管辖。而《通典》卷八六“凶礼八·挽歌”的上一条目为器行序,那里的记载是“大唐制,鸿胪寺司仪署令掌凡引、披、铎、翬、挽歌、纛帐之属”。这里所看到的翬、铎、披(25 挽歌误为帛)在挽歌的《大唐元陵之制》中也曾出现,在鸿胪寺的司仪署掌管的器行序里,挽歌的部分在下一条目(即25 挽歌)中做了较为详尽的说明。(25) 挽歌的《大唐元陵之制》如文字所述,表述的是制度,我推测,从皇帝的角度来说它并没有被定式化,而是根据每位皇帝的葬仪而定,因此才被记载为《大唐元陵之制》。这样,加上《通典》所记载的《大唐元陵之制》,便形成了两种“制”并存的状态。如重新概括,即在《大唐元陵仪注》相关的条目当中,既有引用代宗遗诏的、也有涉及其中一部分的,这便是《大唐元陵遗制》及《大唐元陵遗诏》;而与代宗的丧葬仪礼有关的服制或阐述其它祭祀的运用等议论的内容,为《大唐元陵之制》(3 实质上也符合此内容)。此外,有关作为制度的挽歌,特别是制定代宗葬仪的具体事例的是(25) 挽歌中的《大唐元陵之制》。其他的《大唐元陵仪注》条目,可以将其文字之意,解释为仪注。

以上是对《通典》中的《大唐元陵之制》、《大唐元陵遗制》、《大唐元陵遗诏》、《大唐元陵仪注》的不同表述所作的考察,其结果自然而然地显示出《大唐元陵仪注》关联条目的构成。象这样有关表述元陵的文献中“仪注”、“制”等混杂在一起,例如《通典》所引的“大唐元陵……”等被记载的史料群,大概是讲述该文献是以仪注为中心,把构成代宗的丧葬仪礼等必要的文献归纳在一起的一个过程。很难推测究竟是根据什么形式的史料创造出了《通典》所记载的“元陵仪注”文献的,也可能是把创作仪注过程中产生的议论等以置于仪注之前的形式,并归纳成上奏文由颜真卿呈上的。而且,因代宗的遗诏成为这些议论和仪注构成的出发点,所以我认为遗诏的引用也是必要的。

#### 四

那么,该如何评价杜佑(745 年—812 年)把《元陵仪注》收录到《通典》中的意义呢?一般来说,《通典》被认为是记录到玄宗朝天宝年间为止的事实。而杜佑对开元年间刘秩的《政典》不甚满意,于是对其进行增扩,并加进了开元的礼乐,编纂成《通典》,于贞元十七年(801 年)呈给德宗。那么,杜佑为什么会把自己可能见闻过的记录代宗丧葬仪礼的《元陵仪注》收载进去呢?在这里,必须要考虑的是,《元陵仪注》与《大唐开元礼》之间的关系。在《通典》的《元陵仪注》的末尾处有“其三品以下仪制,并具开元礼”、“其百官以下仪,并具开元礼”、“百官仪

制具开元礼”等记载,有关官僚的丧葬仪礼需要参照开元礼的文献随处可见,由此可见《通典》中的《元陵仪注》与《开元礼》的关系。不过,在《通典》中,与《元陵仪注》不相关之处也常常会出现《开元礼》。在《通典》中,从卷四一到卷一四〇为止的一百卷的“礼”当中,以及前半部分的卷一〇五沿革六五,同样可以散见需要参照开元礼的表述,其中还有“开元之制,最为详备”的表述(卷八七·凶礼九“五服成服及变除”)。并且,卷一〇六以下是把《大唐开元礼》归纳修正后的《开元礼纂类》,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佑对《开元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就是说,《通典》中收录《元陵仪注》是与《开元礼》有关系的,如果说杜佑对《开元礼》给予高度评价的话,那么必须要问的是,杜佑把《元陵仪注》作为怎样的史料收录于《通典》之中的呢?而颜真卿的《元陵仪注》究竟是作为仅为一次的仪式程序而写就的,还是作为具有永久性仪注制定的?颜真卿是德宗即位时的礼仪使,杜佑在呈上《通典》后于贞元十九年(803年)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被提升为宰相,德宗驾崩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若考虑《元陵仪注》与《通典》关系,自然要考虑与德宗朝和王朝礼仪相关联的问题。以我个人所见,德宗与玄宗一样,是唐代对实施皇帝祭祀极为热心的皇帝之一<sup>⑥</sup>。从玄宗这方面看,如果形成于天宝年间的话,祭祀形式会明显地倾向于道教,我认为在其(执政)初期就已经有所谓的脱离女祸恢复皇帝亲政的意识了。而德宗在这方面却没有显示出其个人的嗜好,我认为德宗的祭祀运营与当时的唐王朝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仅仅看与《元陵仪注》相关的即位仪礼,可以说德宗继承代宗的皇位是唐朝历史上举行的一个最为稳妥的(皇位继承)例子。

至此所见的唐朝皇帝的即位,太宗是接受了高祖的让位而即位,出行于终南山途中驾崩。虽然说太宗——高宗的皇位继承也是稳妥的,但从太宗的遗体返回长安后开始举行即位仪式这一点上来看,即位仪礼本身是不符合规则的<sup>⑦</sup>。高宗是在洛阳去世,而当时的政治实权已经掌握在武则天手中。此后,到武后末期的中宗即位为止是在洛阳举行。中宗返回洛阳后被毒杀,中宗之后继任的睿宗让位于玄宗。而玄宗又让位于肃宗,代宗虽然是肃宗的皇太子,但还是排除来自肃宗的张皇后的废代宗皇位的干扰而即位了。就这样,在唐代的德宗之前先帝死后自然由皇太子即位的例子,最多只能举出高宗这一例。德宗于代宗初期的广德二年(764年)成为皇太子,随着代宗的死去而顺利即位。《册府元龟》卷一〇——卷一一中详细地记录了唐代各位皇帝的即位过程,但高宗和德宗的即位却记述得非常简略,给人的印象是其即位是在平安无事中进行的。恐怕颜真卿也同样,自觉代宗——德宗的皇位继承亦如此而已。还有,《元陵仪注》本身,由于发生了“嗣皇帝”和“皇帝”的称谓上的变化,就可以推定新帝(德宗)的即位于殡葬之前、大殓之际举行。从这一点上来看,可谓是珍贵的史料。

德宗在即位的第二年正月,按太清宫——太庙——南郊的顺序各停留一天,举行了皇帝亲祭庆典,他开创了皇帝亲祭庆典的先例。继太清宫——太庙——南郊的三天,一系列的皇帝亲祭出现于玄宗的天宝十年(751年),而把它作为新皇帝即位第二年的庆典祭祀则是德宗皇帝<sup>⑧</sup>。附带说明一下,有名的两税法即是在这时的大赦文中发布的。颜真卿在德宗即位后也担任礼仪使,因此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德宗创建的一系列的亲祭仪式,颜真卿参与的可能性比较大。前面已经说过,在唐代,玄宗和德宗比较热衷于实施皇帝祭祀,而有关二人之间的肃宗、代宗的皇帝祭祀的记录却很少,这可能是在肃宗朝和代宗朝安史之乱的影响比较深的缘故。唐朝皇帝的祭祀分大祀、中祀、小祀三个阶段,但肃宗上元元年(760年)中祀以下的祭祀

被停止,而恢复则是在德宗贞元四年(788年)。颜真卿于建中四年(783年)被派往李希烈的所在地,翌年的兴元元年(784年)被其杀害(补注),而从颜真卿较为活跃的德宗初期开始,恢复皇帝祭祀的态势是比较显著的。

相反,杜佑被启用是在德宗的晚年,但除献上《通典》之举以外,杜佑也与德宗朝的皇帝仪礼有关联。贞元十九年杜佑被提拔为宰相时最初的工作,大概就是在那年举行的禘祭活动中太清宫的虔告(《旧唐书》卷二六《礼仪志六》,同年条)。李姓的唐王朝把同为李姓的老子奉为远祖,天宝二年(743年)给老子加封了大圣祖玄元皇帝的尊号,并把祭老子的庙宇作为太清宫<sup>⑨</sup>。祭远祖老子的太清宫由此具有了祭祖宗庙的性质。虔告的“虔”字是形容词,虔告是在临时祭祀时向宗庙传达的告庙之意。宗庙的种类很多,其中心和最为重要的庙为太庙。贞元十九年,举行了将祖先皇帝的神主(位牌)置于昭穆(后叙)并摆放于太庙的禘祭活动。而在这之前,杜佑已把实行禘祭之事虔告了太清宫。事实上,这次实行禘祭可以昭示开始于德宗朝初期的悬案的终结。因是另外的话题,这里暂且割舍,不对此做详细说明。归根到底,德宗朝时在称为禘祫的宗庙大祭<sup>⑩</sup>上是怎样祭祀祖先的,便成了问题。在唐代,把最初得到唐国公的爵号的李虎(高祖李渊的祖父)作为了唐室的第一祖先——太祖。一方面,唐代的禘祭或祫祭是在太庙西侧最里面把太祖的神主朝东面放置,从太祖的位置往左侧看,就是北侧面朝南的昭的神主,右侧是南侧的面朝北的穆的神主,昭的一列是从太祖开始第一代、第三代…等排列着奇数代子孙,穆的一列是第二代、第四代…等排列着偶数代子孙。建中二年(781年)引起了议论,礼仪使颜真卿说,把献祖李熙(李虎的祖父)放在祫祭的太祖位置上,把其子懿祖李天赐以下置于昭、其孙太祖景皇帝李虎以下置于穆的位置即可。这种表述虽不甚明了,但颜真卿是要把唐室的太祖李虎与在禘祫的祭祀中作为太祖位置的祖先区别开来,才提出了以上建议(《旧唐书》卷二六。以下的叙述主要依据该卷内容)。

颜真卿死后,把献祖置于太祖的位置、把懿祖列为昭、太祖景皇帝列为穆的措施遭到了批判。其争论从贞元七年(791年)开始持续了十年之久,贞元十九年决定,把懿祖从禘祫的祭祀中排除在外,把景皇帝李虎置于“东向之尊”,即昭穆的太祖的位置,把高祖之父元皇帝李昀以下列为昭、高祖以下列为穆。杜佑这时作为宰相向太清宫做了虔告。因此,杜佑与颜真卿偶然地衔接在一起了。《通典》著述之后,可以预想杜佑会对《元陵仪注》抱有一定的批判态度。不过,在禘祭上向太庙虔告(告庙)的是崔损,贞元十四年(798年)崔损也是受德宗之命修复了从高祖开始到代宗为止的八位皇帝的帝陵(只有肃宗的建陵没有修缮)。从这件事上也可以体会到德宗在恢复皇帝祭祀这一举措上表现出的积极性。另外,虽说是高祖以下的八位帝陵,在当时唐朝采用的是九庙制,太庙的九个庙室中除太祖景皇帝以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的八大皇帝神主都收纳在其中<sup>⑪</sup>。虽然这是在代宗驾崩后得以实现的,但对于积极恢复、修整皇帝祭祀的德宗来说,禘祫祭祀中皇帝神主的排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颜真卿的《元陵仪注》以及将其收录其中的杜佑的《通典》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的。

## 五

下面,来具体地看看《通典》对《元陵仪注》的评价。我们事先有必要确认的是,《元陵仪注》是否是以实际使用为前提而制作的便览?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在《元陵仪注》中随处可见一些德宗时期即已停止的与仪礼相关的记述。例如,(25)挽歌中,就有虎贲千人作为挽士牵引载着代宗梓宫(柩)的车(辚车)的记载,而称为虎贲的武官在唐初即被废止。另外,下一个与杜佑对《元陵仪注》的评价有关,(26)葬仪中准备的纁裳实际上在唐代已经不着用了。还有,与其说是《元陵仪注》的问题,不如说是在丧葬礼仪的过程中与德宗政务有关的问题,皇帝到小祥(《元陵仪注》中是从代宗驾崩起第十三天)为止必须住在庐,从小祥到大祥(同样是第二十五天)为止必须住在堊室这种葬仪用的小屋。但是,从小祥开始到大祥期间,还要从事正常的诏令发布和行政事务,因此我不认为德宗会长时间地在堊室里居住。还有,在《元陵仪注》中有关于皇帝不亲临祭祀而由有司代行祭祀的指示,因此可以看出,《元陵仪注》不是特定的便览,而是具有一般性的文献史料。如前所述,德宗朝是重新建树唐代礼制的一个重要时期,因代宗的驾崩而把其神主放入太庙之举(祔庙),以及太祖景皇帝和高祖以下的所有皇帝都排列在太庙的九室等举措,可见德宗具有强烈的再建唐朝仪礼的意识。并且,从代宗到德宗的继承,可谓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在平稳的环境下进行的皇位继承。在这种氛围中,《元陵仪注》不会是只用于一次的便览,而是作为能够传承给下一代的、具有典范性质的仪注来制定的。这恐怕也比较符合德宗自身的愿望。

杜佑对《元陵仪注》的批判性观点,通过以下《通典》中有关玄衣纁裳的原注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杜佑认为,上古人食禽兽之肉,并利用其皮毛制作衣服。周代已使用这样的衣服,秦汉以后的衣服制度由夏殷周三代变化而来,玄纁与皮都不能作为祭祀物品。在这里,杜佑批判地指出,一般来说,礼的制度或仪注是偏重于尊重古礼,而未必是现实中容易落实的东西,这并不是仅仅批判《元陵仪注》中所记述的非现实性。而与此相反,它显示了唐代的仪注是不以实行为前提而制定。即使是杜佑高度评价的《大唐开元礼》,它也未必能反映出开元年间或是唐代的现实,并且,《开元礼》不是以在现实中实行为前提而制定的。这一点,已经被多位学者指出过<sup>⑫</sup>。古代中国的祭祀仪礼,特别是皇帝的祭祀仪礼大部分被儒教的古典记述所制约。颜真卿是在意识到这种制约的同时制定的《元陵仪注》,而杜佑也是在充分考虑到这种局限的基础上把开元礼和《元陵仪注》收入《通典》中的,可以说这还是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状况。

那么,能肯定《通典》是恰如其分地收录了《元陵仪注》吗?遗憾的是,还不能下如此断言。本来,在代宗的丧葬中途举行了德宗的即位仪式,但这件事在《元陵仪注》中却只字未提。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吉礼的即位仪礼与凶礼的先帝的丧葬仪礼要区别开来。但是,其他的例如具体条目的缺失以及在前面的条目里没有出现的東西却出现在后面的条目中,等等,可以指出现存的《元陵仪注》在结构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不过,具体阐述还需要详尽地列举出一些事实,在这里暂且省略<sup>⑬</sup>该部分的说明。



## 六

《通典》所记载的《元陵仪注》,是一部将代宗的丧葬仪礼以及唐代皇帝的丧葬仪礼的大致框架留传下来的极其珍贵的史料,但同时也表明,它并没有完整地把实际的代宗丧葬仪礼留传下来。从历史学的角度怎样看待和分析祭祀仪礼,确实有一定难度,能否分清楚哪部分是主张,哪部分为现实?对其主张与现实的差异能否作出准确的评价?等等。我在思考唐朝的代宗朝、德宗朝所处的状况的同时,也考察了《元陵仪注》的编纂理由以及把它收录到《通典》中的理由,从而更进一步积极地活用了《元陵仪注》文献。如果这篇报告能助诸位研究一臂之力的话,我将非常荣幸。

## 注释:

- ① 天津透著《古代的天皇制》(岩波书店,1999年版)中的第七章“天皇之服与律令、礼的继承”。特别参照了263—264页注(25)。该文章最初发表于1997年。
- ② 金子修一著《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汲古书院,2001年版)第一章改题为“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诸问题”后收录该书(该文章最初发表于1997年)。
- ③ 金子修一等撰《大唐元陵仪注概说》(《文史》2008年第4辑)。又,秦汉时期皇帝陵在其皇帝在位时便开始营造,称之为初陵或寿陵。根据《唐会要》卷二〇陵议的记述,唐高祖的献陵是高祖驾崩后建造的,而太宗昭陵的九嵕山和玄宗泰陵的金粟山是其在位期间就被选定的陵地。“将葬筮宅”是决定地下墓室的玄宫或者墓道开凿口的仪式,是在陵地选定后举行。并且在唐代,即有象太宗或玄宗这样的在位期间就选定陵地的,也有象高祖那样驾崩后才开始在山陵营造陵墓。
- ④ 来村多加史著《唐代皇帝陵的研究》(学生社,2001年版)第280—281页。
- ⑤ 来村氏的理解是,(4)中作为广大的公卿百官的丧服典范(来村氏用语。并不是向天下发布的)的诏案①、与(6)的后半部分所看到的告丧之礼是作为相同的典范用的诏案②,其结果是后者被采用了(注④所著的265—273页)。但是,其各自的内容是,(4)是针对在京的公卿百官服丧的一些具体指示,而相对于(4),(6)的告丧礼文则是对地方的州县官僚做的指示,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代宗的遗诏是禁止地方官的节度使、团练使、刺史等上京,命令他们在当地服丧,但没有指示具体的内容。(6)的告丧礼文可以解释为是对此事的具体指示。另一方面,代宗遗诏针对嗣皇帝的服丧方法进行了叙述却没有涉及京官的服丧,因此可以考虑(4)是对此又做的补充说明。正如来村氏指出的那样,没有必要以此对应(6)的诏案来理解。还有,(4)中所见晋的贺循一文,从《通典》的其它例子来看,恐怕是已经意识到崔祐甫与常袞之间的论争的杜佑的原注。诏敕文或上奏文中引用以往的书面依据时,大概《通典》本文也是会酌情编选的。
- ⑥ 参照金子修一著《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的研究》(岩波书店,2006年版)第七章“唐代郊祀、宗庙的运用”。
- ⑦ 同上所著的第八章“中国古代的即位仪礼与郊祀、宗庙”,参照497—498页。
- ⑧ 参照注⑥中“唐代郊祀、宗庙的运用”及注②中的第二章“中国古代皇帝制的特质”。
- ⑨ 有关太清宫到成立为止的详细情况以及太清宫——太庙——南郊等一系列的祭祀形成过程,参照注⑥中“唐代郊祀、宗庙的运用”一章(356—368页)。
- ⑩ 把禘祭、祫祭作为死去皇帝的神主列于太庙,并举行祖先祭祀的大祭。禘和祫究竟有什么不同?这

一问题本身自汉朝以来一直成为儒学家们议论的对象,在这里就不介入了。最为简单的区别是,禘祭是五年举行一次,在四月;祫祭是三年举行一次,在十月。

- ⑪ 在贞元十九年的禘祭,是将高祖的父亲、没有成为皇帝的元皇帝李昉安置在昭,因此是举行禘祭时的临时措施。
- ⑫ 内藤干吉《关于唐六典的行用》一文收于其专著《中国法制史考证》(有斐阁,1936年版)。渡边信一郎《唐代的元会议礼——〈大唐开元礼〉“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译注稿》(平成7年度——平成9年度科学会成果报告书《帝国系统的比较史研究》,研究代表为若松宽,1998年)。江川式部的《唐朝祭祀中的玄酒和明水——〈大唐开元礼〉的记载及其背景》(《骏台史学》第113号,2001年)。吴丽娱的《礼用之辩——〈大唐开元礼〉中的行用释疑》(《文史》2005年第2辑)。金子修一的《唐朝与皇帝祭祀——其制度与现实》(《历史评论》720号,2002年),等等。
- ⑬ 最后,列举出成为本报告基础的一些论文《大唐元陵仪注试释》(一)——(五)分别刊载于《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纪要》的第三卷第二号(2002年)、第四卷第二号(2003年)、第五卷第二号(2004年)、第六卷第二号(2005年)、第七卷第一号(2005年)、(六)刊载于《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文学研究科》第38辑(2007年)、(七)刊载于国学院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费学术研讨报告书《东亚在世界中的王权形态——从陵墓、王权仪礼的视点出发》(国学院大学文学部古代王权研究会,2007年)、(八)刊载于《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文学研究科》第39辑(2008年)、《大唐元陵仪注附祭注释》刊载于《国学院大学纪要》第47卷(2009年)、《大唐元陵仪注试释》(终章)刊载于《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文学研究科》第41辑(2010年),最后两篇因故不得不另立标题,但从其内容上依然可以说是《大唐元陵仪注试释》的(九)、(十)。

补注:根据《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朱开田在《颜真卿年谱》(西泠印社,2008年版)中指出,《旧唐书》中颜真卿的享年是错误的,他认为正确的应该是第二年即贞元元年(785年),被李希烈杀害。

##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所 与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介

梁海燕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北京 100872)

成立于2005年5月28日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是新中国大学中首家以国学教育与研究并行的实体,实行六年本硕连读的学制。六年来人大国学院坚持“大国学”、“新国学”的理念,初步探索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国学教育创新机制,取得了累累硕果,受到

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肯定。2010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教授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国学新时期的发展”的概念,嘉许冯老的“治学报国精神”。教育部也批准国学本科专业为特色专业,并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列为“创新人